

文本分析版
小说鉴赏 权威评定

2006 年度

藏策
选编并评点



中国
小说学会
编

中国 **中篇** 小说
精 选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2006 年度中国中篇小说精选

(文本分析版)

中国小说学会 编

藏策 选编并点评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06 年度中国中篇小说精选:文本分析版/中国小说
学会编. —天津:天津人民出版社,2007.2
ISBN 978-7-201-05501-5

I .2… II .中… III .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 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19151 号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出版人:刘晓津

(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:300051)

邮购部电话:(022)23332446

网址:<http://www.tjrm.com.cn>

电子信箱:tjmchbs@public.tpt.tj.cn

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880×1230 毫米 32 开本 15.5 印张 2 插页

字数:370 千字 印数:1-10,100

定 价:24.80 元

小说过眼录

——2006 年中篇小说印象(代前言)

藏 策

小说的演进,往深里说是一种话语流变的过程,这多少有点像生物基因的延续,若非恰遇重大历史转折——类似于基因突变——一般来说是不会因年度的不同而有太多变化的。然而正如人类赋予了无始无终的宇宙以时间一样,我们也会以年为季,去检视这一年里中国小说的收获。

话语流变一直以来都是我观察小说的一个独特视角。回顾百年间中国小说话语的流变,其中具有正面价值的突变,多缘于话语资源的匮乏,而亟须引入新的资源来破解已是陈腐不堪的陈词滥调。从形式的角度讲,这叫“陌生化”,从内容的角度讲,人们早已有了个耳熟能详的词,叫“思想解放”。其实这二者是一回事,没有新话语的“新思想”是不可想象的。像“新文化运动”的白话小说,绝不是文言和白话孰优孰劣的问题,而是对“载”于古老修辞方式中的“道”的清算;“新时期”后的各种“现代派小说”,也不仅仅是“形式探索”,而是在“文革”后的话语荒原上,对新资源的开发。这就是话语流变,这就是小说演进深层的话语漩涡。

而现时话语的特点,是“流”大于“变”。如果说 20 世纪 80

年代是个话语恶补的时期,90年代是个消化吸收的时期,那么现在就是个沉淀和酝酿的时期。昔日的先锋,早已放下了高蹈的姿态,唯留下些优雅的余韵。因为“恶补”已成过去,当各类的“叙事圈套”都已不再新鲜时,今日先锋更需要的是植根于母语的话语创新。那些曾伴随着媒体炒作而喧嚣一时的另类“美女”,也纷纷卸妆,或谢幕退场,或洗去铅华淡妆相见。从前些年开始,中篇小说就已经进入了一个话语相对稳定的阶段。

2006年的小说,仍是2005年小说的延续和发展,平顺而自然,不存在基因突变,一切都显得那么水到渠成波澜不惊。2005年里有着不俗成绩的一些作家,如严歌苓、须一瓜、王松、陈应松、杨少衡、叶舟、李冯、迟子建、王祥夫、罗伟章、夏天敏、胡学文、孙惠芬……也依然是2006年度的主力,而另一些实力派如苏童、范小青、李锐等则继续在短篇地带称雄。新旧面孔间的替换,在2006年里并不显眼。大多数作家的姿态是守护式的,既是种调整,也是某种意义上的蓄势待发。严歌苓没能续演《吴川是个好女孩》那样的杰作,杨少衡的新作也没有超越他的标志作品《林老板的枪》。而另一些作家则确实在2006年里实现了对自我的超越,如王松的《双驴记》、须一瓜的《回忆一个陌生的城市》。另外如叶舟的《目击》、胡学文的《命案高悬》、马秋芬的《蚂蚁上树》以及魏微的《家道》、阿宁的《假牙》、迟子建的《第三地晚餐》、王祥夫《尖叫》等,也都令人刮目相看。虽然这么多的小说无法全部选入,但在2006年的中篇小说中,都是绝对值得一提的。

与2005年的小说一脉相承,“底层叙事”也仍是2006年小说中的一个关注点。这实际上已给我们的理论和批评提出了新的挑战。如果仍以过去那种诸如“问题小说”、“干预生活”等等

陈旧的模式解读之,是有将小说重又沦为“宣传工具”的危险的。可以说,意识到小说的“文本性”,是中国小说自 20 世纪末以来的一大进步。

一面是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,一面是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,小说之所以成为小说的“文本性”,究竟谁主谁从,孰重孰轻?这个困扰了中国文学近一个世纪的有关“内容与形式”的老问题,如今又鬼打墙般地横在了我们面前。那些强调文学的社会责任的批评家,在捍卫了良心的同时,也容易给文学加上过多的负荷,使其重返“载道”的怪圈。我个人以为,这首先是个理论上的问题,理论上不能有所突破,批评就不可避免地会夹杂太多的盲目和随意。可以说,整个 20 世纪,中国文论都没能很好地解决有关内容与形式的二元对立问题,这与中国文论始终缺乏对文学话语的深入研究有关。其实,在话语的深层,内容与形式是可以超越简单的二元对立的,因为内容的深层就是形式,而形式的深层则是内容。当某种看似绝对“正确”的“内容”成为不可追问不容置疑的“超隐喻”时,其失败的不仅是形式,而且也是内容。因为无论从**内容**还是**形式**上看,这都是“陈词滥调”。

我们对“底层”的关注,也应是立足于诗学层面的,既要关注“底层”,更需关注“底层如何文学”。如果因“底层”而忘了“文学”,那就会既误了“文学”也误了“底层”。

米兰·昆德拉曾引用奥地利作家赫尔曼·布洛赫的一句话告诉我们:“发现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,乃是小说唯一的存在理由。”

那么,什么才是小说的“发现”呢?

小说的发现,恰恰在于它对生活中那些被遮蔽,被扭曲,被消音了的“声音”的感知和发现。无论其是对人性,对罪恶,对平

庸,对记忆,对潜意识,对梦想,还是对“底层”的发现。我以为,“发现”所给予小说的不仅是“内容”,更是“形式”,因为“发现”其本身就是一种“陌生化”,一种反“俗套”,就是对陈词滥调的刷新乃至颠覆。

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,小说对于“底层”的发现,其旨亦不应仅是大讲“悲情故事”,更不是要“开药方”,而是去发现那些我们平时往往会视而不见的,湮没于“黑压压一片”之中的生动面孔,发现他们不同的生存状态与悲欢离合,发现他们那内在的也是常遭忽视的人的尊严,让我们看到掩藏在喧嚣与繁华之后的另一番景象。“底层叙述”要绝对警惕的是不能走向极端,走向狭隘和仇富;相反地,“底层叙述”应营造和谐与公正,让社会各阶层间多一些理解和沟通,让不同的“社会方言”能平等对话良性互动……小说是在讲故事,但又不仅仅是讲故事。它穿越人类的经验、情感、记忆、想象以及梦与潜意识,一路向我们走来……而一篇好小说最终将抵达的,是灵魂。

在众多的“底层叙述”中,葛水平的《守望》给我的印象颇深。《守望》并没有一味地在“苦情戏”上做文章,而是以特有的女性视角,“平静”地讲述了一个叫米秋水的乡村女子的心路历程。女性主义理论家朱迪丝·巴特勒在其名著《性别的烦恼:女性主义与身份颠覆》中,成功地揭示了性别话语对女性身份认同的“述行”作用。通俗点说,也就是讲女性之所以成为“女性”,并不全然是先天的和自然的,而是被性别话语“调教”成现在这个样子的。再看小说《守望》中的米秋水,在这个女人的身上,我们看到的已不仅是“性别”(男/女)身份对她的“塑造”,而更有城/乡身份对她的“述行”。她的身份已不仅仅是个女人,而且还需再加上个定语,她是个乡下女人。

“乡下女人”的身份认同,在米秋水身上完成得中规中矩:勤劳、善良、简朴、诚实、柔顺……然而她的这种传统“乡下女人”的身份,在今天的“语境”中,是注定会陷入危机的。

这篇小说最为不落俗套之处是结尾,米秋水的死,并非缘于常人已惯于想象的那种社会下层间的“凶杀”,而是误杀。确切地说,是缘于另一“乡下男人”由性苦闷而致性无能的慌乱中的误杀。杀人者与被杀者都是无辜的。而这一切,在一位向往田园生活的都市画家的眼中,竟又成了一幅美丽的风景……

小说极其平静的叙事,与其非同凡响的意旨间,构成了极大的张力,从而摆脱了一般“底层叙事”的粗糙和雷同。

与葛水平的“平静”不同,陈应松的小说则是一点都不平静的。陈应松的叙述话语,有如火山口中喷发出来的岩浆,浑浊、浓稠、莽撞、肆意、喷薄……但却热力逼人。我一向是个极为冷静的阅读者,但在初读他的《太平狗》、《火烧云》时,还是一没留神让他给“烫”着了。英国女作家吴尔芙在谈俄国文学时说:“朴素,不加雕饰,认为在这个充满苦难的世界上,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理解我们苦难的同伴,‘不要用头脑去同情——因为用头脑是容易的,要用心灵去同情’——这就是笼罩在全部俄国文学上的云霭……”我读陈应松小说时的感受,应该与吴尔芙读俄国文学时的感受是相似的——不用头脑去同情,而要用心灵去同情——同样也是笼罩在陈应松“神农架系列”小说上的云霭。

《太平狗》和《火烧云》,都是2005年发表的作品,就不多提了,好在《吼秋》是发表在2006年的。《吼秋》基本上还是《太平狗》和《火烧云》的继续,但没有像《太平狗》那样把“城”与“乡”写成了绝对的二元对立,而是写了一个天灾与人祸的故事。小说里的“人祸”,颇有些像聊斋故事中《促织》的现代版。小说的主

人公是先知兼蚰蚰大王毛十三,他的先知本能一再地遭受打击迫害,而他捉蚰蚰的技艺却备受官员们的赏识……小说的结尾自然是山崩地裂玉石俱焚,其恐怖的场景恰似美国拍的灾难大片。

陈应松的小说,优长与缺失都十分明显,你很轻易地就能指出他小说中某处作者意图太过明显了,某处太如何如何了等等,但他的优长却又是一般作家所难以企及的。陈应松的叙述是不平滑的,也是不透明的。小说的故事推进,总让我联想到那没有轮子的木爬犁,在路表粗砺的乡村土道上前行。他那如咒语般能搅动灵魂的语言,如细加分析,就能发现其中有很多奥妙。你会发现叙述的焦点在短短的几个语句中,都往往会有极快速的变换,“自由直接引语”与“自由间接引语”更是频繁但却又极其自然地穿插其间。他的语句七绕八绕枝杈横生,绝不流畅,绝不润滑,这就使得你的目光很难快速地从字面上滑过去,而不得不跟着他转,转进了小说人物的灵魂,也转进了山野大地的灵魂。他文字间的组合关系,多是断断续续,疙疙瘩瘩,没头没脑的,很难抻成一条直线——那是种不以脑中的“逻辑斯”为轨迹,而以心灵感受为中心的转喻方式。所以他的文字特别具有激荡心灵的效果,以致你还没来得及弄清他的门径,就已经被他给熔化了。还是那句话,他的小说不是写给大脑的,而是写给心灵的。

如果说“底层叙事”是对于“底层”的发现,那么王松的《双驴记》则是对于记忆的发现。他的几篇力作全部来自于记忆深处的打捞,尤其是对早年知青岁月的钩沉。记忆与小说,是天然地有着血缘关系的至亲,因为记忆和故事之间在叙述结构上是有着深层联系的,人在回忆其经历时,最基本的话语方式就是讲故事。当然,小说又不同于记忆,因为小说不是有一说一的回忆

录。小说是对记忆发现和照临,是对记忆的改写和重组,是对记忆最大程度的“文本化”。用王松自己的话说,就是让小说从记忆的领地上“飞起来”。

《双驴记》是王松继《红汞》、《红莓花儿开》和《红风筝》之后,在小说写作上达到的一个新高度。故事依然是他所擅长的复仇故事,但复仇的“参动者”,却由人变成了驴——两头比人更狡黠且被打上了“阶级烙印”的驴。《双驴记》因此而构成了一个隐喻系统,为读者的多重阐释提供了潜在的文本空间。在《双驴记》中,有关驴腿上腋窝的知识,会笑的驴眼,自焚的壮烈等细节十分精到,这些充满了智慧与想象的细节,正是支撑着他飞翔式叙述的起落架。

与《双驴记》相映成趣的是乔叶的《锈锄头》,因为这也是一篇与知青记忆有关的小说。不同的是,王松本人就曾知青,他的记忆主要来自个人记忆,而出生于70年代后的乔叶并没有亲历过知青生活,她的记忆则来源于社会的集体记忆。在传媒高度发达的今天,有关知青的记忆早已经呈现出某种复合式的新记忆特征。越来越多的“经传媒”性的知青记忆,已与亲历性的知青记忆,构成了对话和互动。

《锈锄头》中知青出身的成功人士李忠民,有着浓重的“经传媒”性身影:下乡—返城—奋斗—成功—怀旧—回乡凭吊……这已是从小说里,从电视剧里,从网络里,以及从豪宅和豪车走出来的成功型老知青们所共有的人生轨迹,从这个角度说,李忠民不是单数的,而是复数的。如果说亲历性的知青记忆,是王松营造细节和想象的源泉,那么“经传媒”性的有关知青的集体记忆,则只是乔叶小说的一个“相关文本”和符码化了的背景装饰,就如同那把挂在豪宅里的生了锈而又刷了漆的“锈锄头”。

好在乔叶的《锈锄头》并不是真的要写当年的知青生活，而是在写遥远的乡村记忆与当下乡村现实的对话。而这种对话又是颠覆的和讽喻的，像是“叶公好龙”故事的知青版。

这篇小说的高潮和华彩，就是小说结尾处的那一锄头。我在读这篇小说时，一直都在替作者捏着一把汗，生怕乔叶一时糊涂，让李忠民和石二宝最终理解万岁握手言欢尽弃前嫌……因为那样一来这篇小说将前功尽弃点金成石。——作家写一篇好小说不易，阅读者发现一篇好小说也不易呀！好在乔叶不负所望，最后的那一锄头一锤定音，赋予了整篇小说极大的张力，让原先埋藏在小说肌理中的筋脉一下子都绷了起来，凝聚起极具力道的势能。

乔叶在2006年还有一篇备受称赞的颇具女性主义倾向的小说《打火机》，但《锈锄头》里的那一锄头，让我觉得它比《打火机》更具小说的“文本性”。另外，有关记忆与想象的问题，也更发人深思。李忠民收藏那把锄头，有多少是出自他的个人记忆？集体记忆又对他个人的记忆进行了怎样的改写？又是什么在主导着集体记忆的生成和重构，生产和消费？小说中除了关于知青的想象外，还有关于“富人”的想象，读起来很搞笑。叙述者一“秀”再“秀”的那个可以显示富人身份的POLO拉杆箱，真正的富人其实大多都会对它不屑一顾；那个在农民石二宝眼中“飘飘欲仙”的“玉仙牌”床垫，在睡“海丝腾”、“邓禄普”、“金可儿”的人们看来，岂不就是土炕？如以解构主义的眼光自边缘切入，一切又成了水中月镜中花。可见“发现”其实是很不容易的，“发现”与“遮蔽”往往是孪生的。

而叶舟的小说《目击》，其实正是篇很“解构”的小说。叶舟是个很讲究叙事的作家，他去年有个短篇叫《1974年的婚礼》给

我的印象就很深。《目击》以李小果、李佛、王力可等人物的不同视角去进行多角度的叙述,营造出了种扑朔迷离的效果。妻子的长跪街头,建构了一个爱情的神话,然而建构着神话的人,尚不知自己其实正是悲剧中的主角。略显遗憾的是,小说略显铺张的多角度叙述与最后抖开的“包袱”之间,似有头重脚轻之嫌,且有些简单和直白。如能在“真相”与二李的私情、王力可“钢筋”般的“硬”与肖依的“冷”之间,再做一番微妙功夫,在“修辞”的层面上进行某种反讽,则会更加意味深长。

须一瓜这些年来备受瞩目,不是没有原因的,我以为她的小说是别具一种气象的。小说最忌千人一面,当年“个人化”热时,全是卧室、浴缸加自恋,把“个人化”弄成了雷同化;现在的一些“底层叙事”,也有简单化和模式化的弊病。说《回忆一个陌生的城市》是写家庭悲剧的,其实是小看了须一瓜,《回忆一个陌生的城市》是可以进行多种解读的。从故事表层上看,这是一个重新找寻,重新发现自我的故事。主人公因车祸而失忆,而一本来自神秘人物寄来的早年日记,又将主人公引上了“回忆一个陌生的城市”的自我发现之旅。小说采用后叙事的视角,使读者不能从叙述者那里预知任何信息,只能陪着主人公一起踏上这个匪夷所思的发现之旅。主人公要“回忆”的不是早年的日常琐事,而是20年前的一桩杀人大案。他要追查的凶手或许不是别人,而正是他自己——一个弑父者。

这篇小说如以精神分析法来解读,可能是最有趣味的了。这样一来“回忆一个陌生的城市”便成了一个男人的自我精神分析,成了一个俄狄浦斯的故事。

我不知道须一瓜这篇小说的本义为何,但我相信阅读者肯定可以从其喻指义中,解读出一个弗洛伊德式的箴言——每个

男人的心中都隐藏着一个被遗忘了的弑父者。

让我更感兴趣的是，女作家笔下的“俄狄浦斯”，会不会就是以性别置换的方式“化了妆”的“伊莱克特拉”？

作为昔日“先锋”，格非近年来的作品并不多，但偶一出手仍是功力不凡。格非的新作《不过是垃圾》也是篇“解构”性的小说，昔日的先锋气象仍旧依稀可见。死亡，就像个玩笑，更像是一种修辞。当一如昔日般高傲的女神，在300万的诱惑下，心甘情愿地委身给了“浊物”后。浊物李家杰所得到的，也不是得偿所愿后的快慰，而是更加绝望的一声叹息：“她是一个时代的象征，可这个时代已经永远结束了。”

这是“人之将死其言也善”的李家杰的感叹，也是所有读了这篇小说的人们的感叹。

罗伟章《奸细》里的中学教师徐瑞星，其所遭遇的也是金钱与良知的困扰，只不过他比苏眉的情况更复杂也更窝囊。徐瑞星并不是在钱的诱惑下才做“奸细”的，在金钱面前他始终都能够保持一种比较清高的姿态；相反地，他的做“奸细”倒真有几分散出自一个教师的良知，可惜别人或许永远都不会这么看他。而且内疚和恐惧也像毒蛇一样地纠缠着他，让他欲罢不能，做“奸细”不一定是“坏”人，不做奸细更不见得是个“好”人——小说的高妙之处是将好/坏、忠/奸等简单意义上的语义对立复杂化了，因为当教育蜕变成一种应试而与求知无关，当学校沦落成市侩出没的大集，当课本已不再承载知识而只是标明答案，当传道授业已成为某种变相的“反智主义”时，一切的忠/奸/善/恶亦不再泾渭分明——中学已成为一个“洪桐县”。

教育的异化，是个一点都不亚于“底层问题”的问题。前些年大学里的一些有识之士曾大声疾呼中学的“教育”已与求知相

悖,而几年过去之后,中学未见其好,反倒连大学也有些“中学化”了。小说《奸细》的文本,有着极强的现实指涉力,有些“问题小说”的影子,但又超越了以往的“问题小说”。这种超越其实就是对以往有关“问题小说”的种种“政治正确”的超越,是一颗发现的心灵对于条条框框和陈词滥调的超越。小说唯一的遗憾之处,就是对徐瑞星的同情远多于反讽,太拘泥于利与义关系的表象,没能洞穿这一“反智主义”游戏的深层。

胡学文的《命案高悬》,让人感到耳目一新的是小说的结构,他以一种很“文本”的方式,向我们揭开了覆盖着乡村的帷幕一角。《命案高悬》是一篇颠倒了探案小说,一般探案小说的“叙事语法”通常是侦探主人公推理探源抽丝剥茧,找出躲藏于读者意料之外的罪犯,最终正义战胜邪恶。而《命案高悬》却把命案的真相“高悬”了起来,而且案情也一点都不复杂曲折,复杂的倒是“体制”对真相的极为严密的守护过程。而充当第一道防线的守护者不是别人,正是本该作为“苦主”的死者的丈夫。小说中唯一的一个真正关心案情并决心破解此案的,既非公安也非侦探,而是最初引发命案的“祸头”——一个村中负点小责的游民吴响。他最初对尹小梅心怀不轨,孰料螳螂捕蝉,黄雀在后,就在他设下的陷阱即将有所斩获时,尹小梅却被更大的干部毛乡长带走了,之后竟又不明不白地死了……于是吴响以他自己的方式展开了调查。耐人寻味的是,吴响作为“体制”中的一名小卒时,尽可以去欺男霸女,狐假虎威,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对;而当他被命案所震惊,带着愧悔的心情去做点“好事”时,不但被清除到了“体制”之外,而且更遭受了一次比一次严厉的处罚……

至此,命案的真相到底怎样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,更为重

要的是,到底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真相在权力的守护下依旧“高悬”。

《蚂蚁上树》则是篇写平凡人平凡事的小说,“蚂蚁上树”是平凡如蚂蚁的农民工们的一种自我的“镜像”,是蚂蚁群、蚂蚁阵、蚂蚁大世界中人对自我的反观。这些默默劳作在工地升降机与脚手架上的农民工,远看上去就有如“蚂蚁上树”一般渺小平凡。在多数城里人的眼中,他们不过是些面目模糊的“黑压压一片”,而小说《蚂蚁上树》则“发现”并放大了这个“底层”群体,让人们看清了他们的面目,感受到他们的喜怒哀乐生死爱欲,从而也赋予了他们人格的平等与尊严。

“底层叙事”之所以成为近两年来小说中的亮点,恰恰是因为以前“文学”对“底层”的漠视,所以现在热一热也是正常的。2006年写“底层”的小说里,还有像曹征路的《霓虹》,孙惠芬的《燕子东南飞》等一些各具实力的作品。

2006年度的中篇小说,在总体上可以说仍是2005年小说的延续,从话语方式上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变异,这是个相对平稳的年度。不过,2005年里那篇令我极为倾倒的中篇小说——严歌苓的《吴川是个好女孩》,在2006年的中篇小说里却没能出现可与之比肩者,这多少显得有些遗憾。就连严歌苓自己的那篇发表于2005年末转载于2006年初的《金陵十三钗》,也无法与之媲美。当然,有些东方“羊脂球”式的《金陵十三钗》也还是不错的,无愧于其赢得的好评如潮。只是考虑到它原发于2005年的12月份,就不便选进2006年的小说中来了。还是那句话,小说的演进是一种话语流变的过程,年度的选本无异于从话语的江河中提取一两杯水样,遗漏和偏颇都是在所难免的,唯愿其长如源头活水,清且涟漪。

目 录

小说过眼录

——2006年中篇小说印象(代前言)

..... 藏 策[1]

双驹记 王 松[1]

回忆一个陌生的城市 须一瓜[44]

奸细 罗伟章[87]

吼秋 陈应松[149]

守望 葛水平[194]

命案高悬 胡学文[244]

目击 叶 舟[306]

锈锄头 乔 叶[363]

不过是垃圾 格 非[396]

蚂蚁上树 马秋芬[429]

双 驴 记^{*}

王 松

直到若干年后，马杰才告诉我，他终于真正了解了驴这种畜生。他是在大学里学到这些知识的。他读的是农学院。这让我很不理解。我和马杰同是 1977 年参加高考，而且在同一考点的同一考场。但后来，我去师范大学数学系报到时才听说，他竟然考去了农学院的牧医系。说牧医好听一些，其实就是兽医。那时电话还不普及，农学院又在市郊，交通很闭塞，所以直到上大三时我才给他写了一封信。我在信中对他说选择这种专业表示不解。那时还是计划经济，大学里包分配，这个说法今天的大学生未必能懂，也就是毕业后学校负责分配工作，因此一旦学了什么专业也就如同嫁人，注定一辈子要从事这种工作。我在信中对他说，农学院，又是牧医系，将来的去向可想而知，大城市里的骨科医院或妇产科医院自然不能为牲畜治病，难道你去农村插队几年，在那种地方还没有呆够吗？我又在信上说，你对哺乳类动物感兴趣不一定非要学兽医，人也是哺乳动物，你完全可以去读医学院。当时我想，我在信中的言辞可能过激了一些，而且事已至今，再说这些话也没什么意义，当然，马杰也未必会以为然。马杰一向是个很自信的人，无论什么事都有自己的主见。几天以后的一个上午，我刚下课，系办公室的老师来叫我，说我的电话。我立刻猜到了，应该是马杰，别人找我不会把电话打到系里去。果然是他。他的情绪听上去很好，说话还是那样不

^{*} 选自 2006 年《收获》第 1 期。